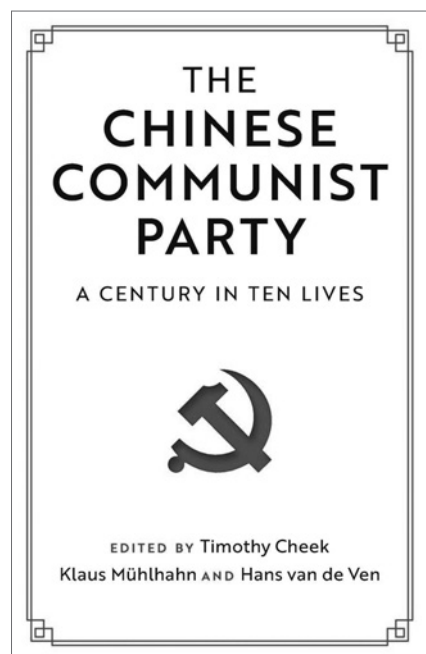


# 宏大敘事之外的百年黨史

——評 Timothy Cheek, Klaus Mühlhahn,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 周 琪

《百年十傳》是一本以十位歷史人物的生平傳記為基礎，綜述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至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之蛻變的新作。書中收錄的人物形象繁多，不僅有政治領袖，也有與中國革命密切相關的外國人與女性等。



Timothy Cheek, Klaus Mühlhahn,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一 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敘事

《中國共產黨：百年十傳》(*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以下簡稱《百年十傳》，引用只註頁碼)是一本以十位歷史人物的生平傳記為基礎，綜述中國共產黨從1920年代建黨之初至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之蛻變的新作。本書由歷史學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余凱思(Klaus Mühlhahn)與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編輯，並另邀知名學者與資深媒體人撰寫而成。本書出版正逢其時，時值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媒體，都在廣泛熱議「百年大黨」的曲折歷史道路與未來走向。僅就黨史研究而言，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可謂車載斗量，但像《百年十傳》這樣以個別人物為切入點的學術論著仍

屬少數。若與同類型論著比較，例如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的《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等經已翻譯成中文的經典作品，本書同為後現代敘事主義史學的產物。此類作品不再採用強調整體性、主題性的宏大敘事形式，而以更具個人特色、鮮活細膩與人性化的論述取而代之<sup>①</sup>。《百年十傳》中收錄的人物形象繁多，不僅有政治領袖，也有與中國革命密切相關的外國人與女性等，藉此突出中共更國際化、都會化與民主化的一面。這些歷史人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多樣，有些從革命領袖淪落成棄子，有些則在政治聚光燈下跌宕起伏，還有些不經意地成為政治明星或者政治話題。如此豐富的人物選擇，呈現出更多元化的眾聲群像，也提供了更具人性化與戲劇化的歷史敘事。

《百年十傳》除導論與後記外，共有十章。每章以一位歷史人物為題，時間橫跨幅度約為十年，闡述該人物於當時中共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前五章涵蓋中共建黨至建國的武裝革命時期。第一章由塞奇 (Tony Saich) 所撰，記載荷蘭共產主義者馬林 (Henricus Sneevliet) 於1921年首度提出「統一戰線」，為中共日後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鋪路。第二章由方德萬所撰，記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於1937年促成國共聯手抗日未果，反而間接影響中共與國際共產組織的關係。第三

章由齊慕實所撰，記述作家王實味於1942年因刊登一系列諷刺性雜文而在延安整風運動被批鬥的悲劇。第四章由張濟順所撰，闡述上海影星上官雲珠於1950年代從都會明星慢慢轉型為黨內文化工作者的過程。第五章由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所撰，以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妻子王光美早年的政治運動與其在文化大革命的慘況作比較，反映其身份的矛盾和複雜性。

本書的後五章聚焦改革開放時期。第六章由藍詩玲 (Julia Lovell) 所撰，描述1970年間秘魯共產主義激進份子古斯曼 (Abimael Reinoso Guzmán) 運用他早年從中共獲得的知識與資源，把共產主義傳播至秘魯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過。第七章由余凱思所撰，刻劃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於1980年末推動民主化改革以打擊貪污濫權等社會問題的過程，雖然其計劃未獲黨內元老支持，但他的願景反映出植根於中國共產主義的民主思想。第八章由許紀霖所撰，描繪知識份子王元化於1990年代對社會弊端之種種反思，包括學術圈喜聯群結黨的亂象，以及消費主義對人文精神帶來的嚴重破壞，其思考呈現了當代知識份子從革命理想階段過渡至改革開放時期的精神風貌與社會抱負。第九章由金玉米 (Jeremy Goldkorn) 所撰，縷述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於2000年代的政策，及其為之後兩任繼任者帶來的影響及隱憂。第十章由楊國斌所撰，析論在2010年代「初代網紅」郭美美引發的網絡現象，見證了中國網絡空間逐漸收窄的過程。

《百年十傳》中的歷史人物均見證、參與甚至推動了中共某個重

《百年十傳》中的歷史人物均見證、參與甚至推動了中共某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但因其國別、性別或政治立場等原因，並非始終居於黨史論著的中心位置。本書透過重新聚焦這些被主流論述符號化、邊緣化甚至遺忘的人物，為詮釋百年黨史拓展更多可能性。

本書採取全球化視野的研究取向，不但記述共產黨於中國的崛起過程，也花相當多的篇幅來研究中共在不同時期如何與國際地緣政治接軌。譬如馬林於1921年試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故事，體現了中共建黨之初與國際反殖民運動的關係。

要的歷史時刻，但因其國別、性別或政治立場等原因，大多並非始終居於黨史論著的中心位置。本書透過重新聚焦這些被主流論述符號化、邊緣化甚至遺忘的人物，呈現幽微深刻且鮮活立體的中共歷史圖景，為詮釋百年黨史拓展更多可能性。正如導論所言：「過去百年，中共印證了其驚人的決心與化解危機不懈的能力，如果有一個值得汲取的教訓，就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儼然成為一股不能被輕易打敗或單純被孤立的勢力。……若要懂得如何有智慧地與其交往，必須先對中國及其主導的共產黨有透徹的歷史理解。我們需要一個深入的歷史觀（deep historical approach）。」（頁6）

本書的編撰正正希望達到此目的。下文將從三個角度剖析此書：首先以馬林、王明與古斯曼的故事，探討中共與世界革命、冷戰、第三世界左翼發展等地緣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然後藉上官雲珠與王光美的故事，揭露黨內女性在國族主義與父權思想夾擊下如何掙扎求存；最後則透過書中對王實味、趙紫陽、王元化、江澤民及郭美美的傳記書寫，補充一些在過往論述中被忽略的人與事。筆者希望透過地緣政治、女性議題及人物傳記三個角度，突顯本書對當前中共歷史論述的貢獻。

## 二 從環球視野看中共

中共肇建於半殖民的上海法租界，在中國國內的反帝民族主義與蘇聯引領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洪流下壯大，全球冷戰與第三世界國家的

反殖民運動將毛主義引入全球，而革命退潮之後中國又成為全球資本最活躍的經濟體，凡此種種，說明中共的崛起與世界的政治及經濟發展緊密結合。本書採取這種全球化視野的研究取向，不但記述共產黨於中國的崛起過程，也花相當多的篇幅來研究中共在不同時期如何與國際地緣政治接軌。

譬如第一章記述馬林於1921年試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故事，體現了中共建黨之初與國際反殖民運動的關係。馬林相當強硬地要求中國的共產主義人士不要獨立成黨，反而應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原因並不只是對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組織有所質疑，更是源於過往的反殖民運動經驗。作者表示，馬林到中國之前，曾在荷屬東印度（現印尼）參與反荷蘭殖民政府的社會運動，他將此類運動定性為「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ary）運動，意即鼓勵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以獲得更大的抗爭籌碼（頁13）。當時中國飽受列強侵略，情勢與荷屬東印度類同，故馬林銳意開展國民革命運動，藉着國共合作以捍衛中國主權。馬林比較偏向國民黨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從反荷蘭殖民運動中明白到革命的主力為工人力量，而湊巧他於1921年到桂林會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時，親身經歷了同年於中國南方爆發的海員示威運動，他發現比起共產主義人士的不聞不問，國民黨至少曾試圖協助此次工人運動，故相信國民黨有更大的社會基礎去教育及團結工人，共產主義人士應當加入國民黨，借助其現有組織架構來組織工人力量（頁15）。雖然馬林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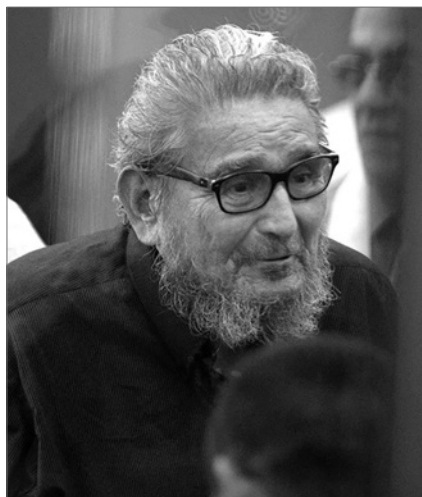
理念被以張國燾為首的大部分中共黨員強烈反對，也遭到蘇聯部分人士的非議，未能於其任期之內實現，但他的「統一戰線」策略日後獲中共反覆採用，包括在戰時與國民黨共同抗日、在建國後團結黨外份子以及在改革開放時期連繫國際機構等，成為所謂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影響相當深遠<sup>②</sup>。從馬林的故事可以知道，中共建黨之際與國際反殖民運動有着盤根錯節的關係。

同樣，第二章有關1937年王明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故事，也體現出國共合作與全球左翼運動發展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作者表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王明等共產國際的核心人物致力推動國共合作，不只是因為擔心東亞局勢失利，會引發日本全面侵佔中國，進一步威脅蘇聯這個共產主義的大本營，更是因為各國的共產主義社會運動岌岌可危，如1936至1937年納粹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正式向共產國際宣戰；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左翼勢力支持的共和派與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為首的國民軍陷入苦戰，大大阻礙共產國際的發展 (頁32)。在此國際形勢下，共產國際下令停止各國的階級鬥爭，加強各國共產黨派與自由派的合作，建立國際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於是派遣王明到延安成立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國共兩黨攜手抗日。可惜戰事未如預期，隨着抗日戰爭爆發後武漢於1938年失守，同年共和派在西班牙內戰中因失去法國的支持而

節節敗退，蘇聯終於在1939年簽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承諾與納粹德國維持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變相宣告國際人民陣線的失敗。由於人民陣線的失敗，此計劃的領頭人王明首當其衝，在中共的政治生涯告終。由此可見，中國的統一戰線與全球共產事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國共合作因而未能繼續下去。統一戰線的失敗的確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局勢拉開了全新的局面，亦意味着戰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放棄跨國合作，開始以國家為單位發展共產主義 (nationalized communisms)，為後來中共擺脫蘇聯的制約埋下種子。

第六章有關古斯曼於1970年代起在秘魯傳播共產思想的故事，印證了中共在國際共產思想領域裏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古斯曼與中共的淵源甚深，早在1960年代他還在大學裏教授哲學時，曾至少兩度到訪中國觀摩學習，並於回國後在大學裏傳播共產思想，培養年輕的追隨者。他在1970年正式成立自己

馬林、王明與古斯曼的故事，見證了中共從民國初期到社會主義末期的蛻變，若說在第一、二次國共合作之時，中共仍活在蘇聯陰影之下，到毛澤東執政之時，中共已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影響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發展。



1970年代末以後，縱然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備受質疑，但仍透過像古斯曼這樣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徒流傳至國外。(資料圖片)



的共產黨分支「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仿效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通過大學學習小組深入農村小鎮，進而發動反政府革命，持續至1992年他被政府軍抓獲。毛澤東思想不但驅使尼泊爾共產主義人士發動內戰，也啟發了土耳其、孟加拉、海地甚至英美等地成千上萬的共產主義人士。正如作者所言，在1970年代末以後，縱然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備受質疑，但仍透過像古斯曼這樣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徒流傳至國外，徹底改變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生態(頁147)。

以上馬林、王明與古斯曼的故事，見證了中共從民國初期到社會主義末期的蛻變，若說在第一、二次國共合作之時，中共仍活在蘇聯陰影之下，為其環球共產布局所制約，到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執政之時，中共已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大本營，持續輸出共產思想、資本及武器，一舉一動都影響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發展。

### 三 從女性角度看中共

本書也銳意記述更多具代表性的女性歷史人物。在過往中共歷史論述中，較多地把重點放在農村女性經濟或階級問題上，分析她們是否能透過共產革命來解決生存困境<sup>③</sup>。這是緣於中共的政策定位。中共視婦女解放為其中一項重大議題，早在建黨之初提出的〈婦女運動決議案〉已視女性解放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要目標，雖然一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作的女工，

但很快便轉向龐大的農村婦女人口上，例如毛澤東於1927年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具體地描寫農村女性視遭受封建、宗法及父權的多種束縛，必須透過政治革命來擺脫其生存困境<sup>④</sup>。有別於過往農村女性的研究，本書着眼於城市女性如何憑藉自身的知識、人脈或閱歷等，參與政治運動，介入歷史走向，甚至有時為了自保，徘徊於善惡難辨的灰色地帶。她們並非待解放的低下階層，而是投身政治浪潮的歷史主體。她們的故事將為中共的女性議題帶來更多面向的討論與激盪。

第四章上官雲珠的故事展示了一名都會女性如何適應與成長環境大相逕庭的社會主義文化。上官雲珠是民國時期的上海當紅影星，1949年後主動靠攏新政權，演出一系列社會主義電影及話劇，她演出的話劇《紅旗歌》在上海公演過159場，風頭一時無兩。除了演出左翼電影外，她也響應政府呼籲，穿上女幹部流行的列寧裝，公開支持政治及社會活動，並學會寫自我批評、個人歷史及思想匯報，以此來改造自己的形象。在1951年「三反」運動中，上官雲珠因丈夫程述堯被批鬥而受牽連，但她成功爭取到幾次與毛澤東共膳的機會，得以從「落後份子」獲提升為「可被教育的模範」，重回銀幕演出。雖然上官雲珠未能在後來的文革倖免於難，但她由上海灘的都會影星搖身一變成為左翼文化工作者的經歷，頗有參考價值。作者表示，這位影星在社會主義時期受到重用，並因中共復興影業而獲得大量演出機會，反映出中共思想中有一種潛藏的「都

雖然關於共產主義的想像往往與延安的農村生活掛鉤，但從上官雲珠的故事可以看出，共產主義也能在像上海這樣的繁華城市裏生根發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上官雲珠由上海灘的都會影星搖身一變成為左翼文化工作者。(資料圖片)

市現代性」(metropolitan modernity, 頁 87)。雖然關於共產主義的想像往往與延安的農村生活掛鉤，但從上官雲珠的故事可以看出，共產主義也能在像上海這樣的繁華城市裏生根發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共在鄉村革命理想與都會左翼浪潮之間的矛盾與融合，呈現出紛繁複雜的一面。

第五章王光美的故事反映了女性知識份子如何隨着變化莫測的政治局勢而載浮載沉。王光美出生於北京富裕的知識份子家庭，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原子物理研究生學位的女性。抗日戰爭爆發之時，她放棄留學的機會，加入共產黨從事外交翻譯工作，並於 1947 年參與土地改革運動，與日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相戀結婚。1963 年她到河北參與四清運動，蹲點數月後發現幹部腐敗瀆職行為泛濫，於是聽從毛澤東的意見，在桃園開展群眾運動，以「扎根串連」方式，安插當地青年去查探及記錄鄰舍基本情況，以暴力

手段鬥爭當地幹部。其後她把這五個月的鬥爭經驗寫成〈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俗稱「桃園經驗」)，在全國廣為流傳。然而弔詭的是，這場讓王光美聲名鵲起的四清運動，最終竟變成她與丈夫的罪證，令夫妻二人身陷囹圄，直至毛澤東死後王光美才獲釋。出獄之後，她除了幫助丈夫平反外，還致力於婦女的慈善活動。從王光美的故事裏可以看到她是群眾鬥爭的發動者、參與者，但最終被群眾運動反噬。作者表示，王光美複雜的一生，其實展現了中共於改革開放之前在革命黨與執政黨兩重身份之間的徘徊，革命黨所倚賴的群眾運動模式與執政黨的官僚治理模式相互對抗，而王光美則成為兩種治理模式博弈的代表人物與犧牲品。

上官雲珠與王光美的故事有類同之處，也展現了性別在中國革命中的複雜作用。兩人都是因為受男性領導人提攜而參與社會政治運動。上官雲珠在「三反」運動之後獲毛澤東的青睞，才得以擺脫身份污點，重新參與社會主義電影演出工作。同樣，王光美受丈夫劉少奇的鼓勵步入政治舞台，從一開始的外訪工作到後來的四清運動，並在毛澤東的鞭策下在桃園開展群眾運動，然而隨着政治運動風向突變，王光美也隨丈夫一起成為文革中的犧牲品。從上官雲珠與王光美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和婦女解放在男性主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尷尬地位。雖然中共革命本身將實現婦女完全且獨立的人格地位作為終極目標，同時不斷通過制度設置(如《婚姻法》)與宣傳工作(如「鐵

從上官雲珠與王光美的經歷，可以看到女性和婦女解放在男性主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尷尬地位。革命中的婦女需要運用自身的知識、才幹與人脈，在革命的威權與父權的夾縫間生存。

本書透過傳記書寫的方式，探討歷史人物的思想及行為背後之誘因與動機，或者在黨內外權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圖顛覆對這些人物的既有印象與觀感，以更周密詳盡的方式刻畫歷史個體與中共發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姑娘」、「婦女半邊天」等口號），試圖完成婦女解放這一現代化課題；然而，無論是黨的領導、革命運動的需要，還是建立在經濟能力上的階級身份劃分等，經常將女性置於次要的角色。革命中的婦女需要運用自身的知識、才幹與人脈，在革命的威權與父權的夾縫間生存。她們的故事補充了過往以男性為主的歷史論述，為中共這段重要的歷史增添了女性獨有的生命力。

#### 四 從傳記書寫看中共

有別於過往以重要事件為敘述引子的歷史論述，本書聚焦在歷史人物本身，透過傳記書寫的方式，探討歷史人物的思想及行為背後之誘因與動機，或者在黨內外權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圖顛覆對這些人物的既有印象與觀感，以更周密詳盡的方式刻畫歷史個體與中共發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第三章王實味的故事便是一例。過往歷史論述傾向把丁玲與王實味放在一起討論，以丁玲的政治轉向為主線，把王實味視為與丁玲政治取向差不多但下場不同的參照對象。譬如在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就闡述丁玲如何鼓勵包括王實味在內的一眾作家以諷刺雜文來針砭時弊，未料遭到毛澤東等黨內高層的批評。與王實味堅守己見不同，丁玲為求自保而摒棄原來立場，作者借此來對比兩人在政治洪流下迥然不同的抉擇<sup>⑥</sup>。然而本書的論述重點有所不同，雖然也有提及王實味和丁玲的關係，但花費更多篇幅分析王實味政治取向的起源

及發展，並把他在整風運動的悲慘經歷放在中共批鬥知識份子的歷史脈絡下分析研究。王實味在五四運動薰陶下成長，熟讀現代小說、話劇與翻譯作品，並翻譯不少馬克思及列寧的著作，對托洛斯基主義尤感興趣。他認為中國從外國傳入革命思想時，不需拘泥於國家固有的表達形式，反而可以以文學形式來傳遞思想。然而，王實味這一套具國際觀的思想，與毛澤東在1942年致力發展以工農兵為主的本土文藝形式大相逕庭，種下兩人日後衝突的根源（頁57）。王實味在1942年響應丁玲呼籲，以〈野百合花〉為題寫下四篇雜文，批評中共領袖貪圖逸樂的文化，招致黨內高層不滿，因而在整風運動中遭到責難，後來在國共內戰期間被秘密處決。作者特別指出，王實味被批鬥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首先由中共黨員私下向王實味、丁玲等領頭人施加壓力；未獲滿意回應之後，開始公開審問王實味，以「托洛斯基主義者」入罪，加強群眾對他的負面印象；最後採用斯大林清洗間諜與叛徒的方式，把王實味構陷為「五人反黨集團」之一，這一套模式日後成為文革時期批鬥知識份子的範本（頁61）。從王實味的不幸經歷，可以預見到中共在社會主義時期對知識份子的高壓統治將變得愈來愈全面、極端及系統化。

第七、八章以極為生動的方式敘述了中共政治人物趙紫陽與黨內知識份子王元化的故事。他們都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過往論述大多側重他們與保守派之間的角力，以及在大型政治活動或學術論戰中扮演的角色。但本書聚焦在他們政治

哲學的根源，包括所受到的共產主義理論教育、文革時的生活經驗與衝擊，以及對改革開放時社會變化的反思等，闡明了一套植根於中國土壤、與西方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自由派理論，顯示了中共更開放、更具包容性的一面。上述人物傳記透過不同歷史個體在經歷政治事件及社會變遷時作出的選擇，突顯不同人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掙扎與堅持。

第九章江澤民的故事聚焦於他在二十一世紀中共政策變更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作者表示，主流媒體所謂的「胡錦濤與溫家寶管治下的中國自由主義黃金時代」，實則應歸功於江澤民（頁202）。江澤民主政期間（1993-2003）力推「三個代表」政策，將中共從革命黨轉向成為執政黨，並且通過改變黨員的階級屬性和政黨的執政使命，試圖將中共的執政基礎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相結合。這種政治取向吸引了大量外來資本與人才流入中國，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建立良好的基礎；即使在退休以後，他仍然手握大權，以確保國家的基本政策不變。在江澤民領導之下，媒體空間更加擴闊，社會價值觀更趨多元化，學術與文化活動達至新高峰。但作者無意為江澤民樹碑立傳，相反指出他雖有管治之功，但是其對繼任者胡錦濤的控制，其實一定程度上窒礙其改革能力，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延宕未決，包括腐敗問題及媒體引發的管治危機等，讓胡錦濤的繼任者習近平一上台旋即面臨異常棘手的局面。綜上所述，此章並非單純議論江澤民的功過得失，而是透過他在權力更替中所扮

演的角色，揭露中國從自由主義邁向威權統治的曲折因由。

第十章郭美美的故事甚少在主流歷史論述裏出現，只有在大眾媒體上才會讀到關於她炫富、賭博及性交易等的醜聞，但媒體只會視之為社會道德淪喪的個別案例，甚少把她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問題，用來探討新世紀中共發展歷程乃至宣傳管制與網絡文化發展之間的張力。郭美美是2010年代「初代網紅」，因為在網站上分享她的奢華生活而備受注目。當時在網絡上炫富的人不少，顯示隨着社會主義時代的過去，富足生活代替革命理想成為中國人民新的精神標竿。郭美美因為其新浪微博賬號被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被很多網民認為她跟中國紅十字會有關，引起他們對公營慈善機構的憂慮，因而以人肉搜索和舉報等方式，希望媒體及當局闡清事情真相。作者表示，由於中國紅十字會高層均為黨員，網民對郭美美事件的質疑，其實也是一種對共產黨的間接挑戰（頁216）。此事件成為中國網民透過網絡來搜查與鞭撻社會及政治問題、試圖在網絡空間內開拓公民社會的經典案例。然而，隨着中國政府透過一系列手段收緊線上輿論空間，譬如在2011年開始實行新浪微博實名制，2015年推廣「文明」網絡文化，2017年通過《網絡安全法》等，成功把網絡空間收編為政治宣傳工具。郭美美的網絡現象見證了網絡媒體從代表公民聲音演化為維穩工具的過程。

以上王實味、趙紫陽、王元化、江澤民與郭美美的故事，均提供一些以往被主流論述忽視的細

郭美美事件成為中國網民透過網絡來搜查與鞭撻社會及政治問題、試圖在網絡空間內開拓公民社會的經典案例。然而，中國政府透過一系列手段收緊線上輿論空間，成功把網絡空間收編為政治宣傳工具。



節，從更人性化、更立體的角度理解中共歷史發展。

## 五 小結

《百年十傳》是一部優秀的歷史作品，透過人物綜論的方式敘述過去百年間的中共歷史，從環球視野出發看中共如何與地緣政治接軌，從性別角度看活在中共威權下的女性如何參與政治，從傳記書寫出發補充以往主流論述略過的細節，內容涵蓋廣泛，題材引人入勝。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是，由於本書由多名作者所寫，風格與題材各異，若編者能以過渡章節闡明不同章節之間的內在連結，將更能引發讀者思考。另外，部分章節敘述稍為寬泛，例如在第三章論述納粹德國、西班牙、法國等在1930年代的戰況時多用簡筆（頁32、37），在第六章論述秘魯內戰時並未提供執政黨的背景（頁132）等，恐怕對不太熟悉世界史的讀者造成一定的閱讀難度。

但本書整體而言瑕不掩瑜，對沒有中共背景知識的讀者來說，是一本有趣的入門讀物；對熟悉相關歷史的讀者來說，亦能幫助他們在既有論述的基礎上開拓新的思路。正如寶靈 (Philip Bowring) 於後記所言，中共並非一個永恆不變的黨派，相反在過去百年間，不同的領導人、知識份子以及一般百姓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去詮釋與實踐共產理念（頁240-41）。雖然不一定帶來持久的改變，但無可否認他們勾勒出一個更國際化、更自由及更人性化的藍圖，為將來中共的發展留下無法預測的政治遺產。

《百年十傳》是一部優秀的歷史作品，內容涵蓋廣泛，題材引人入勝。但由於本書由多名作者所寫，風格與題材各異，若編者能以過渡章節闡明不同章節之間的內在連結，將更能引發讀者思考。

### 註釋

① 有關現當代歷史哲學理論的潮流，參見Julia Nitz, "History, A Literary Artifact? The Traveling Concept of Narrative in/on Historiographic Discours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5, no. 1 (2013): 69-85。

② 值得補充的是，中共在2015年發布《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推動無黨派人士、少數族裔領袖、宗教領袖及港澳台居民等之間的聯繫團結。詳見Laura de Giorgi, "United Front",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303-308。

③ 有關中國婦女解放的研究，參見Kathy L. Walker, "The Party and Peasant Women", i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7*, ed. Philip C. C. Huang, Lynda S. Bell, and Kathy L. Walker (Berkeley, CA: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57-82; 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④ 參見Wang Lingzhen, "Women's Liberation",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315-24。

⑤ Jonathan D. Spen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1982), 305-309。

周 琪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博士生